



朱熹文化价值理念的本体论（全相佑）

(2007-6-18 17:39:10)

作者：全相佑（韩国新罗大学哲学系）

符合具体的物而成为具体的事物，具体的事物也处于各自最合当的位置，朱子就把这种物事解说是义。因此，仁就是共同性，义就是分殊。比喻说爱，爱就是首先爱其亲，次爱亲戚，然后爱乡里的人，爱宗族，然后进一步推到天下国家。这爱虽然是贯通家，乡，宗族，天下国家的理一，但是其具体的发用也不不能没有层次的差别性，如果没有普遍爱，则亲，家，乡里，宗族，天下国家的人不能相亲相爱，如果没有具体的差别爱，则爱就是丧失其实现处。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下，朱子也批判扬朱，墨家，而说：

“言理一而不言分殊，则为墨氏兼爱。言分殊而不言理一，则为扬氏为我。所以言分殊，而见理一底自在那里，言理一，而分殊底亦在，不相夹杂”

朱子认为墨子，扬朱都偏重于理一分殊两面中的一面。墨氏只言理一，而不言分殊，陷于兼爱，而扬朱却只言分殊，而不言理一，陷于利己主义，理一分殊不相离。因此，如果说分殊，则理一已存在于分殊之中，如果说理一，则分殊存在于理一之中。象上面所说的那样，朱子把仁义说明是理一分殊，理一就是仁，分殊就是义。仁就是大化流行处，但是其大化流行处必须有合当处，把其合当处就是义。

“义却是羞恶之理，发出来方有羞惡”

“问：孟子言：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又曰：义之实，从兄是也。不知羞恶与从兄之意，如何相似？曰：不要如此看。且理会一处上义理教通透了，方可别看

“义主于敬，如贵贵，则自敬君以下，以至与上大夫，下大夫言许多般

朱熹认为人为了维持社会秩序，必须区分社会构成员之间的差别性。朱子把差别性看作是义，朱子把义解说是事之当为，其合当的实质就是差别的原则。從仁的觀點來看，義是仁的分殊，但是義也具有體和用，這一點和二程的“仁是体，义是用”的觀點有不同。朱子也把义看作未发，而羞恶就是已发，但是从社会差别性的原则来说，而尊兄就是社会区别的根本。社会的差别性是从羞恶发现，从尊兄开始而扩大到贵贤，贵贵，敬君。羞恶之情在社会关系中不同的表现就是分殊，义就是本体，羞恶就是作用，羞恶之心使义发现羞恶，而同时也把羞恶之情获得中节，作用中有本体，而进行义之全体流行过程。朱子又说：

“见尊长之属，便有恭敬之心”

“礼却是辞逊之理，发出来方有辞逊”

“人之行礼，其初岂无些恭敬之心，亦缘他装点得来过当，便埋没了那恭敬之心。而今人初以书相与，莫不有恭敬之心。”

义就是社会差别性的内的表述，礼就是社会构成员之间的差别性在具体行为方式中的外在表述，即，节文和恭敬。礼是义的表现，义是礼的本质，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义就是体，礼就是用。朱熹认为下人恭敬社会长辈，君主等的时候，恭敬之情发现，人性的礼在和具体对象的关系上发现为恭敬之情，礼就是恭敬之理，具体的恭敬之情就是礼的表现。通过恭敬之心连结作为本体的礼和恭敬之情，朱熹说：

“知事亲从兄之所以然者，智之本也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”

“知觉自是智之事，在四德是贞字，而智所以近乎仁者，便是四端循环处”

“仁包四端，而智居四端之末者，盖冬者藏也，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。智有藏之义焉，有终始之义焉，则测隐，羞恶，恭敬三者皆有可为之事，而智则无事可为，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，是以谓之藏也。又恻隐，羞恶，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，而是非则有两面。既别其所是，又别其所非，是终始万物之象。故仁为四端之首，而智则能成始，能成终”

朱子认为，爱从仁发现的时候，由父子之间，而扩大到仁民爱物，爱一面具备差别性，一面也具有普遍性。智就是对于这种爱之本源的认识。智虽然属于四德中的终，但是知中也具有生理，也要回复又仁，如果没有智，恻隐的生气则停于智上，也不能回复作为本体的仁。恻隐，羞恶，辞让各具有自己具体的人事，但是知没有具体的行为，只是逢到具体的事态，而判断其是非，然后发现恻隐之情的。朱子所理解的智不像上蔡的‘知觉为仁’说那样，把知觉看作是仁，把仁包含于智，而认为智就是仁之一部分，但是智也为仁能发现的条件。如果没有智，则仁也不能发现。朱子也把仁说明是四端的全体过程。

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仁义礼智是人性，人性发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，心连结性和情的关系，本性由于心发现情，情也依据心具有中节之理。仁义礼智在社会价值理念中具有各有各的功能，仁就为社会构成员之间的和谐原则，义就是社会构成员之间的差别原则，礼就是社会构成员的规范原则，智为社会构成员的判断原则，这四种性为人的社会本性。虽然人性各各具有其固有的作用，但是其本性也统合于一个价值理念。因此，朱子也依据心结合四种本性。心就是贯通未发和已发的统一概念。未发就是静，已发就是动，静就是仁义礼智浑然的状态，动就是接触外部事物而发现的状态。心又不是未发，又不是已发，而是主宰从未发到已发，从已发到未发的全体流行过程，其实仁义礼智就是从仁发现的四德，恻隐之情中节，而为义，义也发现羞恶之端，羞恶之情中节，而为礼，礼也发现辞逊之端，辞逊之情中节，而为智，智发现是非之端，是非之情也回归于仁。朱子把这种全体过程看作是心，认为心之所以可以活动的根据是从仁的恻隐之端开始的。朱子说：

“惟是有恻隐之心，方会动。若无恻隐之心，却不会动。惟是先动了，方始有羞恶，方始有恭敬，方是有是非。动处便是恻隐。若不会动，却不成人。若不从动处出发，所谓羞恶者非羞恶，所谓恭敬者非恭敬，所谓是非者非是非。恻隐之心，头尾都是恻隐。三者则头是恻隐，尾是羞恶辞逊是非。恻隐是个头子，羞恶辞逊是非便从这里发来”

朱子认为首先只有恻隐之心，心才能进行大化流行的过程，恻隐之心的端绪在于恻隐，恻隐就是未发发现的端绪，我们从这端绪可以看到生理。恻隐之心就是心之全体过程的始作，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是从这恻隐之心中出来的，因此，恻隐之心是为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根本，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恻隐之心的末，恻隐之心属于人心中的继之者，善也，是天理流行之始处，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属于人心中的‘成之者，性也’，是成就各自本性，如果没有恻隐，则羞恶辞让是非不能发现。因此，恻隐包含羞恶辞让是非，但是羞恶辞让是非中也具有恻隐，如果四情没有恻隐，羞恶也丧失其道理，辞让丧失其道理，是非也丧失其道理，这种恻隐就是羞恶之为羞恶的所以，辞让之为辞让的所以，是非之为是非的所以。这种恻隐之心贯通羞恶辞让是非之心，而形成心的全体过程。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是大化流行过程中的一部分。恻隐之心就是共同性，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是差别性。朱熹说：

“得此生意以有生，然后有礼智义信。以先后言之，则仁为先，以大小言之，则仁为大”

“仁所以包三者，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，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抽出”

朱熹认为只有恻隐之心的生意，才能有礼义智信，仁就是包含义礼智三者的，从仁出来的仁义礼智也不是固定的，也是不动的，仁和义礼智的关系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，从先后来看，仁之理一就处于义礼智分殊之先，义礼智之分殊处于仁的理一之后。从大小来看，仁就是大，义礼智就是小。朱熹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理论基础之下，把仁规定爱之理，心之德，而结合本体和发用。

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了，朱子仁说是在和张南轩进行对于仁问题的讨论当中形成的。朱熹在致张南轩的书信里说：

“熹详味此言，恐说‘仁’字着，而以义礼智与不忍之心均为发现，恐亦未安。盖人生而静，四德具焉。曰仁，曰义，曰礼，曰智，盖根于心而未发，‘所谓理也，性之德也’。及其发现，则仁者恻隐，义者羞恶，礼

者恭敬，智者是非，各因其体以见其本(端)，‘所谓情也，性之发也’，是皆人性之所以为善者也。但仁乃天地万物之心而在人者，故特为众善之长，虽列于四者之目，而四者不能外焉。〈易传〉所谓‘专言之’，则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，非别有包四者之仁，而又别有主事之仁也。...今欲极言仁者，而不本于此，乃概以至善目之，则是但知仁之为善，而不知其为善之长也。却於已發見處方下‘爱’字，则是但知己发之为爱，而不知未发之爱之为仁也。又以不忍之心与义，礼，智均为发见，则是但知仁之为性，而不知义•礼•知之亦为性也。”

张南轩认为仁就是本体发现以前的本体，义礼智与不忍之心就是本体的发现。仁就是体，义礼智和不忍之心就是仁的作用，体和用不能分开的，但是朱熹首先说明仁义礼智就是性之德，人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性，人性发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就是性之情，仁就是恻隐的理一，恻隐就是仁的分殊，义就是羞恶的本体，羞恶就是义的作用，辞让就是礼之作用，礼就是辞让的本体，智就是是非的本体。朱熹认为仁义礼智之性就是人性之所以为善的本体，但是朱熹另一面也说明人性中的仁也是天地之心赋与给人的，把仁说明心，其心就是仁义禮智之长，处于仁义礼智之先，虽然这样，但是作为人心的仁不是离开这四性而存在的，人心的仁贯通于仁义礼智四性中。因此，张南轩只知道仁是恻隐之心和义礼智的本体，而不知道作为人心的仁是善之长，张南轩把仁看作是离开义礼智的本性，因而只是把仁看作是性，而不知道义礼智也是性。朱熹说：

“又看仁字，当并义，礼，智字看，然后界限分明，见得端的。今舍彼三者而独论仁字，所以多说而易差也。又谓体用一源，内外一致为仁之妙。此亦未安。盖义之有羞恶，礼之有恭敬，智之有是非，皆内外一致，非独仁为然也。”

朱熹认为仁是人心的全体过程，义礼智就是人心中的部分作用，因此，仁必须和义礼智一起看，但是从本性来看，仁和义礼智之间也有差异性。在张南轩哲学体系里，仁只是性，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